



20岁在中央美院画室 布面丙烯 喻红

严肃的摄影家与嬉皮的画家

Serious Photographer and Hippie Artist

□杨小彦 Yang Xiaoyan

前一阵子参加了广东美术馆的两个研讨会，一个是摄影家吕楠的作品研讨，一个是画家宋永红的作品研讨。吕楠的研讨会由我来主持，讨论题目也由我来定。宋永红的作品研讨会由香港资深画廊经纪和策展人张颂仁主持。

我比较了解吕楠的工作。他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总共拍摄了三个主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吕楠拍摄了“精神病人”，时间是三年，走访了三十多家精神病院，一万多个精神病人。按照吕楠的说法，他从来不搞突然袭击，而是和病人交往，让他们玩自己的相机，直到对相机不再有陌生感，也熟悉了摄影家的存在后，才开始拍摄。当时这个题材非常敏感，无法在中国出现。但这一组作品却给吕楠带来最初，同时也是最实在的国际名声。他以“马小虎”为笔名在日本的展出时，几乎就受到国际摄影界的关注。在完成了一组作品后，经过适当的休整和准备，吕楠开始了第二组作品的拍摄，那就是“中国乡村的天主教”。为了完成这一拍摄，吕楠前后花了有五年时间，走访了许多农村。拍摄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比如被不理解他的工作的当地警察抓拿，摄影器材被没收，甚至被更高级别的有关部门注意。但无论如何，他的工作还是大致上完成了，作品一出来就受到专业的好评，但同样没有在国内媒体出现，也无缘展览，反而又是在国外获得好评。之后是第三组作品的拍

摄，在西藏，时间同样是五年左右。据吕楠告诉我，他的这组作品是走访了四十个村子的结果。2006年在平遥摄影节上，吕楠的这三组作品被编辑成一个完整的系列，用PPT方式，成为这个摄影节某一个夜晚的内容。放映现场人山人海，整个过程观众屏息静气，放映之后则是持续不断的掌声，说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在广东美术馆展出吕楠的作品，算是他在国内政府展览馆第一次亮相，尽管摄影界早就熟悉了吕楠，但对普通公众而言，吕楠仍然是一种略带神秘的存在，所以展览仍然是有意义的。展前，馆长王璜生找我商谈研讨会事宜，表明他对这个展览的重视。坦率说，我也愿意为吕楠的作品研讨会做些事，不仅我们是多年的朋友，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还是国内唯一和吕楠有过正式对话，因而为他留下评论文字的人。这得益于李媚和她的《现代摄影》的安排。针对吕楠的工作，我提出的研讨题目是“隐蔽的现实与深度的观察”。之所以提出这个题目，在于我希望通过对吕楠作品的研讨，来求证一个摄影家，当他自觉意识到其社会责任感时，是如何来看待那些边缘的社会现象，以及如何观察这些社会现象，并通过自己的工作，提示背后的意义，从而唤起人们的关注。而且，在圈定参加研讨会的名单时，也把视野扩大到摄影界以外，从而保证在研讨上能够把问题引向更有价值的方向。受邀名

单中有著名影视人类学家邓启耀教授，他对云南的民俗有长期的观察与研究，这使他有资格针对这一问题发言。另一位著名学者是艾晓明，她对社会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边缘群体的深度关注，也确保了其发言的力量。冯原则是跨学科的一位学者，他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也会提供使人们跳出摄影之外看摄影的机会。广东摄影界重要的摄影家也亲临现场，他们不仅是吕楠作品的专业解读，更是对其意义深感兴趣的实践中人。

研讨会只开了一个下午，但时间紧凑。摄影家们相当严肃，包括他们在会上的争吵，多少体现了对一种价值观的关注。比如，北京画廊的那日松坚持宣称吕楠的“艺术家”立场与眼光，而深圳的摄影家余海波则认为，吕楠的作品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他的纪实立场是摆在那的，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纪录眼前的事实。艾晓明是推动讨论走向深度的关键人物，她在肯定“精神病人”价值的同时，质疑其中的问题，摄影家是否认真考虑过同样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病人”的权益，他们以他们所无法预知的姿势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当中还有不少是裸体。艾晓明呼吁艺术家们，当然，在这里她首先是指摄影家们，能否超越完美的审视眼光和动人的形式，而把一种思想冲突的力度展现出来，并让普通人参与其间。有意思的是，摄影家对艾晓明的呼吁是认真的，好几个人在发言时宣称，在他们的实际工作

中，考虑拍摄对象的权益是必要的，甚至是构成其摄影工作的重要前提。张新民在述说与吕楠的交往时，再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那就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对象的意愿，都应该让镜头的价值能够准确传达出一种公正与平等。

宋永红的研讨会我是被邀请的人，邀请由广东美术馆发出。坦率说，即使没有这邀请，只要有时间，我估计也会前往。一是，我当年和宋永红有所交往，多年未见，他现在已经功成名就，见面叙旧是应该的。二是，听说有几位同行出席，比如吕澎和吴鸿，还有朱其。主持人张颂仁谈不上有很多来往，但彼此认识。

这是一个让我很失望的研讨会。失望原因有二：一，无话可谈。主持人不知道需要在这样一个“常规仪式”中说什么，没有可谈的题目，更没有什么准备，只好东拉西扯，其中还有不少关于香港的废话，弄得与会者在底下瞪眼直视主持人和画家扯淡。好不容易有些人谈稍微正经的内容，却无人回应。甚至，我私底下还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谈“正儿八经”的话题，简直就是自讨没趣。在这样一个场合，只有一个话题是大家有点兴趣的，那就是“怀旧”，谈点当年“革命”的业绩，调侃一下成功前的困窘。包括我在内，也只能围绕过去的岁月，说些开玩笑的东西。二，甚至无会可开。开会前，馆长王璜生积极周旋，中午一点半就希望能够开始，可惜好几个“大腕”迟迟不到。好不容易到了，发言也是东拉西扯。我相信与会者中大多数人都知道，此类会只是“走过场”，“例牌货”，开与不开都一样。有人上午参加开幕式后就打道回府，已经说明他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仪式，不必认真。

既然都知道这是一个仪式，看得明白些，还不如不开，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或者，来者既然都有历史渊源，一个圈子的，也不要在那个场合开什么鬼会了，找个好玩的地方，聊聊天，怀怀旧，开开玩笑，岂不更好？

当然，想深一些，如果真要认真开个什么画家的研讨会，谈什么，估计会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吵架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越来越主流化，其中的资本量也越来越惊人，这说明当年吵架的理由，早就不复存在，当年关注的问题，恐怕也烟消云散，还来谈什么？人们明白，这种会，既不能当众指出画家的不是，也无法说些作品的坏话，唯一可行的，就是谈相关问题，至少探讨一下未来的可能性。但现在，我看连这个话题也几乎不可能再谈了。很多时候，这种话题谈起来会几近废话，甚至是那些所谓搞理论的人的一种顽强的自恋。

我发现，把两个研讨会比较起来，摄影家太严肃，而画家却又太嬉皮。不能说吕楠的研讨会就“成功”。这种会，能够谈点问题就已经不简单了，所以不能追究问题的深度，更不能质疑其实际价值。这一类会议，通常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除非历史学家事后去记录与分析。摄影家严肃，大概和他们的工作性质（纪实）有关。他们总要面对社会，面对现实，而不能够完全面对自己。此外，摄影家，除了极个别外，比如吕楠，绝大多数都谈不上什么“成功”，尤其像画家那样，名声和经济都获得的那种“成功”。许多摄影家已经被画家的成功弄昏了头脑，都

在梦想着像画家那样，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够拍出个上百万上千万的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不算太“成功”，“大师”的滋味没有尝过，所以摄影家们还保持了些许严肃的品性，有时会严肃得让人不知所措。相反，画家的嬉皮是有传统的，一种类似波希米亚的人生态度，早就注入了他们早年生涯的血液之中，否则人们无法理解90年代艺术界会冒出个“玩世”和“泼皮”来。上海学者朱大可分析说，画家们比谁都更敏感地发现了“去智”与“呆傻”的价值，他们正是在这一风格平台上，让其与生俱来的“流氓习气”得到了充分表达的机会（见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据说成功画家内心也有苦恼。当他们的风格已经延续了数十年而不变更时，当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不成大问题时，他们在得意之后，可能会不时冒出忧虑，这个忧虑就是如何在未来的风格争夺战中继续领先。其实，这是一个谁都说不清楚，更无法预测的问题，甚至是个假问题。至少就社会意义来说，这个问题的实质仍然只关系到市场占有率，而无法涉及更多内容。

现在我要问，当代中国，至少架上绘画这一块，究竟还有没有问题存在？某些极端先锋的人士，一开始就在形式上否定了“架上”的意义，认定只要是“架上”，就和“当代”没有关系。据说这涉及到了“方法论”，一个越谈越糊涂的概念。因为，不同的“方法论”会有不同的答案。按照“艺术终结论”或“艺术死亡论”的意见，连装置和行为都成为“终结”和“死亡”的证据，更遑论架上绘画了。按照“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的经验主义观点，说架上绘画没有意义，这种说法至少缺乏逻辑依据。从布迪厄的角度来看，从某一体制中生产出来的艺术，只不过体现了与这体制密切相关的象征领域交换的原则而已，连“讨论艺术”都没必要。

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艺术形势与艺术现场，嬉皮实在是画家们自我保护的最有效的办法，而且，嬉皮还有一种超然性，不介入争吵不说，更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内心的轻视。这说明，艺术真的已经没有问题了。至少，中国当代艺术是这样，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研讨会开不起来就是一个证明。

最后，我要问，严肃的摄影家和嬉皮的画家，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现象，包含着我们所希望讨论的问题？

For such a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art and art scene, hippie is the most effective approach for artists' self-protection, and hippie there is a transcendent, in addition to not intervening in disputes, it just rightly expresses the neglect in their mind. It shows that the art really has no problem. At the very least,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has no problem. The seminar cannot be opened up is proof.

Finally, I have to ask a question. Whether the serious photographer and the hippie artist is a phenomenon in itself, which includes all things we want to discuss?